

中文版
第十五、十六期



RC

文化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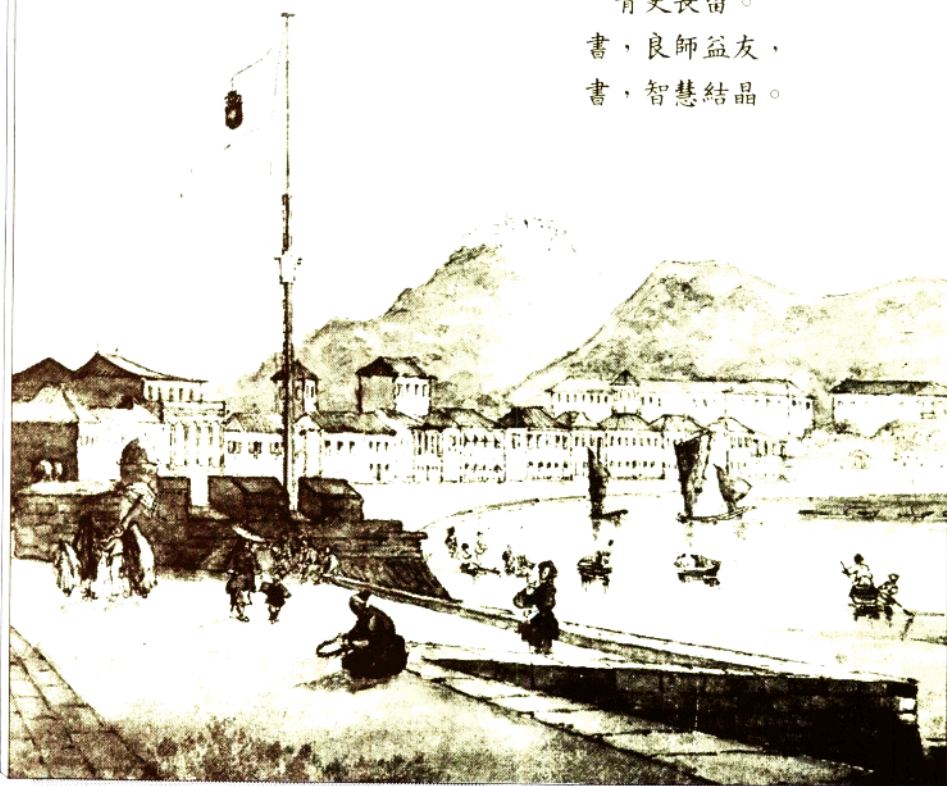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前澳督羅必信回憶錄
一幅送給雍正皇帝的里昂拉宮壁毯
土生群體・起源問題
澳門妓業面面觀
澳門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的
書籍是你的良師益友，欲購買請到
澳門板樟堂街16-18號葡文書局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是一部傑作，
由兩國人民譜寫。
作家、詩人、學者
妙筆生花，
澳門因之生輝，
青史長留。
書，良師益友，
書，智慧結晶。



《文化雜誌》中文版十五、十六期——澳門文化司署1993年第3季度

印數：2000份



文化雜誌 1993

RC

文化雜誌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主編

官龍耀

中文版編輯

黃曉峰

助理編輯

李淑儀

編輯部秘書

高連達

秘書助理

施利華

美術主任

馬偉達

美術設計及排版

畢必道

植字

澳門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

柏昇電腦植字排版有限公司

攝影

鄧顯熙、林國權

印刷

鴻興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分色

色擇分色有限公司

編輯部

澳門高地烏街 27 號二樓

電話: 512280/5993110

圖文傳真: 592002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澳門新口岸海景花園

新安大廈 87-U

電話: 700391

文學

中國二十世紀文學中的女性

澳門：從歷史失語症看跨世紀文化整合

——兼談語言教學中的文化因素

澳門的跨文化交往

澳門港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和影響

——過渡框架中的社會問題、公共行政和社團組織

社會學

澳門的司法與社團

——澳門妓業面面觀

舞女和歌女

起源問題：澳門土生的家庭與族群性

——人類生物學的若干資料

人類學

土生群體

〔附錄〕雍正皇帝

一幅送給雍正皇帝的里貝拉宮壁毯

——前澳督羅必信回憶錄

歷史

澳門紀實：憑欄聖珊澤



目錄

《文化雜誌》中文版 第十五、十六期 澳門文化司署出版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澳門文化司署

OPERTA



瑪·昂阿娜布拉

劉月蓮／黃曉峰

盛炎

陳炎

桑托斯

伊·努內斯

賈淵／陸凌梭

安·瑪·阿馬羅

若·德·拉莫斯

3 8

12 19

35

57 71

77 84 96

封面說明

二十年代的澳門，不同凡響的人物紛至沓來。他們的存在為以後的世世代代打上了印記。這時，與文字和思想的燦爛光輝相比，經濟發展相形遜色。當時，知識界的研討與聚會不斷。

與此同時，來自世界各地的冒險家們也來到這裡，他們把澳門變成一個有歐洲人存在的東方神話城市，一個使各國文人騷客嚮往和競相吟頌的神秘的地方。它或許是索然無味的二十世紀僅存的神話之一。



南灣一瞥 (節顯照攝)

《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五期、十六期

文章作者：

若·德·拉莫斯

安·瑪·阿馬羅

賈潤/陸凌梭

伊·努內斯

桑托斯

陳炎

盛炎

劉月蓮/黃曉峰

瑪·昂阿娜布拉

《文化雜誌》對下列機構及個人特表鳴謝：

澳門歷史檔案館

澳門中央圖書館

謝樹先生

嚴樹芬先生



是一份研究文化的雜誌，亦為切磋學問的自由論壇。其宗旨是推動東西方文化交流，探討澳門獨特的個性及葡萄牙在東方的歷史，進而加強中葡兩國之間的密切往來。

為此，本雜誌刊登任何有關上述主題的文章，祇求學術價值，不拘政治見解，作者文責自負，其觀點和理論並不代表本刊立場。

雜誌編輯部有權不發表與不退回無約投稿。



是一份季刊，用葡、中、英三種文字出版，各文版根據不同語言讀者的實際情況，在內容上略有增刪。有心的讀者將會注意到這種差別，並領會我們的意圖。在此，我們向各位讀者、學者和收藏家們推薦，訂閱全套的(三種文版)雜誌會更有參攷價值。

憑欄聖珊澤

前澳督羅必信回憶錄



1950年的聖珊澤總督官邸（澳門歷史資料館存照）

本文是我們請六位澳門前總督撰寫或口述的六篇系列回憶文章中的第一篇。為使回憶有一個廣闊的天地，我們試圖以《憑欄聖珊澤》這個統一的題目，通過文章的作者們對在澳門的特殊生活經歷和與澳門聯繫的回憶，收集到能夠反映澳門當代歷史的發展與曲折的資料。根據編年史的順序，本期刊登1962年4月就職澳門總督並於1966年卸任的羅必信准將的文章。

I

1、作為澳門的前總督，我以最大的熱情接受澳門文化司署司長先生的邀請，對我在聖珊澤宮的那段歷史時期“交待”一些回憶，談一談印象和若干片斷。

說來很奇怪，我曾在夜晚長時間地坐在聖珊澤宮的“陽台”上凝視着散佈在澳門半島周圍那幽暗動蕩的各方面上的小島，陷入沉思和“內”省

之中。

2、我將從我那一屆政府最關心的方面開始回憶。

我是唯一健在的“四·二五”以前時期的總督，因此，我還將談到那個時期的一些特別的事情作為補充。

最後，我還將就澳門的前途這個人們關心的問題談一些想法。

II

3、澳門緊緊與中國大陸相連，周圍是中國的水域，幾乎沒有自然資源。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澳門的總督希望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好的睦鄰關係。

與今天一樣，那時澳門的人口組成以中國人為主，而中國人中又有數量可觀的流動人口和難民，是一個多種遺傳基因混血的社會。然而，在兩個如此不同種族的人民之間，兩個相距如此遙遠的文明之間，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間，始終存在着友好相處與理解的傳統關係，四百多年間，理解與尊重不同習慣，以及在種族融合中的無與倫比的和睦終於導致了遠東獨一無二的具有歷史傳統的多種族社會的形成。

實際上，土生是一個非常與眾不同的葡萄牙人羣體，在其工作過的世界各地，他們都以其智慧、文化修養和葡國精神而出眾。

但是，澳門政府並不因此而不再感到困難，其中許多困難來自地方政府的錯誤，或內部的紛爭，也有的來自鄰居們的要求或壓力。

4、當然，我無意現在在這裡為當時總督的所為辯護，或為本應當做而沒有做的事情申辯理由。我僅希望強調一下政府在六十年代所遇到的困難。資金嚴重不足，1966年的預算約為五千萬澳門幣，不過八百多萬美元。當時的發展計劃預算，即政府和自治機構全年的可用資金只有約五十萬康托(Conto)。這些數字無法與現在的預算相比。除此之外，當時的公共組織機構和民間企業包括其生產和工作能力也都無法與今天的相比。

只要回憶一下就不難理解：1966年，澳門政府是由總督組成的，有一位辦公室主任，一位秘書和一位侍應官，以及幾個由政務司領導的公共機構。

5、在我這一屆政府期間，對待問題的解決方法，特別是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政治問題上，或者是影響到與它有關的組織或個人的問題時，必須經過再三斟酌。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因為

當時葡萄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以及福摩薩外交部在澳門至1965年4月設有特別代表處。關於後一個問題將在後面談到。

其實，葡萄牙人在澳門的四百多年中，澳門雖小，卻從來就是一個很難管理的地區，幾乎總是讓將軍和後來的總督們頭痛。縱然如此，葡萄牙的旗幟始終飄揚在這個“忠誠可嘉，僅此天主聖名之城”的旗桿上。

6、我們一貫認為，增加政府重要部門中的澳門當地專業人員是重要的，同樣，地方名流，葡萄牙人、澳門人，以及中國社團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應當指出，我們始終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良好合作。

這樣，我們對於那些明顯的政治紛爭、或已釀成問題才送到總督這裡來的事情，在一些看似可笑實則對中國利益構成實際問題的事情上，都經常聽取他們的意見。

在這些問題中，遠的不說，青洲菜地和外港的填地問題就是例子，這裡的建設和修路問題上就常常發生利益糾紛。還要經常在專門會議上，聽取由總督領導的政務委員會的意見。這裡我不提人名以免惹出不愉快。

7、對於政府來說，澳門的穩定是其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事實上，政府勢力支持以增加和改善工業活動的方式來促進澳門的進步，因為，不能主要依靠當時收入最大的黃金業和博彩業。除此之外，當時政府活動最突出的特點也許可以說是明顯的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的政治因素。由於這個原因，加強同一些澳門的中國社團的關係，對於政府來說，就有了特別的利益。

何賢，作為中華總商會會長、北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澳門中國人的代表，是澳門中國社團最著名的領導人、葡萄牙人可信賴的朋友和立法會委員。

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傑出而睿智的人士，總是願意並隨時與總督合作，解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關的當地或對外關係上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棘手”事件。需要指出，這裡所說的“棘手”在澳

門具有非同尋常的含義。有的時候，一些涉及葡國管理公共機構、軍事部門或市政廳的小問題，捲入中國居民的利益之後，特別是工人協會為保護會員利益介入的時候，小問題就釀成了大問題。不止何賢，華人社團的其他重要人物，如馬萬祺，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崔德祺，市政廳行政委員會委員和崔樂祺，都曾在與政府的接觸中盡力保護過澳門的利益。

8. 我來到澳門不久，發生了在我們水域，一艘水警稽查隊的巡邏艇收容了被一艘中國巡邏艇追捕的幾名中華人民共和國逃跑者的事件。通過與何賢的交談，我認為最好開始與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澳門的實際代表、南光公司董事長柯平(Ho Ping)先生接觸。聯繫就這樣建立了，不過，是以私人方式，會面地點就在聖珊澤住所。

我一直認為這些接觸非常有用。在大約三年當中，我們保持了非常好的個人關係，當然，我們的接觸是非官方性質的，而且，海外部長薩拉查博士對此完全瞭解。

不過，只有當發生了嚴重事件時，這主要是指有關福摩薩代表處活動的事件，或者，當收到廣東政府用中文寫來的信、受廣東政府外事部門負責人的委托將已經譯成葡文的信轉交“羅必信先生”時，柯平才與總督聯繫。

9. 在我任職期間，對方政府的來信一般都是通過柯平先生或何賢先生轉交給我，並且，崔樂祺總是在場用葡文對來信作解釋。來信中經常提到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經常提到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要求將我在前面談到的七名逃跑者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指出他們在逃跑之前犯有間諜罪。澳門政府以政治避難權利為理由，從未接受中國的要求，但是，為了避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產生更大的糾紛，政府把他們關押了起來。

——對方當局指出，澳門官方廣播電台向以在澳門建立公司為幌子的美國人出租這件事。

澳門政府深入地研究了這件事和以合同向

電台租用時間的美國公司的性質。總督在聽取了法律顧問的意見之後，決定考慮宣佈該合同作廢並無效，同時終止租賃，這使那家公司到海外事務最高委員會去告狀，但是遭到拒絕，至此，這件事才告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福摩薩政府在澳門的代表處的活動侵犯了它的主權，是犯罪行為。事實上，他們是指該代表處若非領導、也是在幫助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敵的秘密活動，說它與其說是一間外效機構，不如說是一個秘密活動和間諜中心。這樣，通過海外部，中央政府決定批准澳門政府的建議，於1965年4月，關閉了該代表處，雖然福摩薩政府一再反對，也無濟於事。

來信還提起美國駐香港的外交使團有不多不少七位派駐澳門的領事，每一位都帶有專門“任務”。在美中關係的困難時期，澳門是一個很好的入口。

III

10. 1961年10月，當我在南布拉(任當時莫桑比克該省省長)受阿德利亞諾·莫雷拉(Adriano Moreira)博士邀請接受任職時，提出同時兼任澳門武裝部隊司令為先決條件。在當時來講，這樣做出於兩個基本原因：

——不希望退出軍界，當時，我已離開軍界幾乎三年了；

——希望減少當時突出存在的陸軍司令部與政府之間的摩擦，將陸軍司令置於武裝部隊司令和總督領導之下。

只是當時的陸軍司令是具有上校軍銜的顯赫軍人埃杜阿多·貝薩(Eduardo Bessa)炮兵上校，而總督只是一個中校，這樣，在葡萄牙武裝部隊的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由薩拉查政府以特別權力和委任書任命一位中校澳門司令官，領導一位上校陸軍司令和一位具有海軍中校軍銜的海軍司令。以後，再未發生任何摩擦，總督與兩位司令保持着良好的私人關係。這在軍級等級森嚴的制度下，不能不說是一個獨特的情形。其實，只

要晉升一級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無須增加任何開支，因為，武裝部隊司令是個不拿薪水的職務。但不知甚麼原因，他們不願意這樣做。

11、1962年4月，我就任總督不久，第一次在聖本多的部長議會主席當時來說非常簡樸的住所受到薩拉查博士的接見。當時，我們看見市政建設用的泥製模型，這是準備建造供澳門大約幾千難民住的。主意是國際天主教慈善會（Caritas）駐葡萄牙的代表D·費爾南多·加爾丁提出的，據說是較容易接近薩拉查博士的人。

從模型旁經過時，他問我說：“你看見這個了嗎？”我答看見了。他接著問道：“怎麼樣？”我認為不會被接受，從中國難民特別的生活方式和低生活水平考慮，對他們也不合適。”他以其特有的沉默聽著，正像人們說的那樣，他不大多言，更喜歡聽別人講話。

顯然，這些模型雖然在以後送去了澳門，但並沒有像那位女士所說的那樣經薩拉查博士批准而建造。

12、我想起1962年，為了保證澳門的城市發展計劃能夠繼承建築傳統，保留優秀的原有建築，並且，遵守建築學和城市建設常規，我們曾促成一個青年建築設計師小組訪問澳門。

這個包括有前途的著名建築設計師馬納拉斯和維森特的小組在發展計劃處（Departamento do Plano de Fomento）的框架內工作。

面對中國政治組織和本地建築者的多重壓力和利益，工作遇到多很大的困難。

小組完成和指導了許多研究工作，製作了模型，特別是制定了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的外港一帶的城市規劃，經研究選址在雞頭山建一個機場。這項研究是在我的要求下，經有名的機場專家若奧·托馬斯·修（João Tomas Siu）工程師的指導，由民航總署來完成的。後來，應我的邀請，若奧·托馬斯·修出任工務運輸司長。

實際上，早在1985年，澳門總督白覺理少校在澳門期間就曾向海外部建議在外港修建一個

飛機場；在他的要求下，經陸軍司令的同意，身為工程師的當時衛戍部隊參謀長起草的方案甚至已包括在1959-62年的補充發展計劃之內。那個機場可滿足當地的飛行需要，並可起降DC-3式飛機。

如人們現在所見，澳門機場正在興建中，然而，建機場的想法絕對不是近年才提出的，祇是由於在那個時候，必須考慮當時飛機和機場的特點、建設機場所需技術手段的實際可能性和澳門公共財力的許可，並且，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必須面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外交關係這個現實，這在許多問題的包圍中是一個決定性因素。

13、一天，具體日期我已無法指出，一個政府重要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來到總督辦公室，帶來一些建議請求批示。

讀完其中一份文件，總督面有愠色地把文件還了回去，說道“這不是我範圍的事，是你範圍的事博士先生”。“我範圍的，總督先生？我承認這件事相當令人不愉快，但一切都是按程序辦的，”他說。“道理很簡單，我說，‘宰雞焉用牛刀，這種‘小問題’，屬於你的工作範圍，親愛的博士。”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14、1966年，因在橋梁方面的革新性設計而馳名葡萄牙和國外、並享有很高聲譽的埃德加·卡爾多索（Edgar Cardoso）教授在一次結束公務從帝汶回國時路經澳門。

午餐時，人們談起澳門——氹仔島和氹仔島一路環島之間的交通問題。當時，正在氹仔和路環之間進行對於澳門的發展至關重要的填海工程，因為當時的澳門人滿為患，而離島又明顯落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船隻不足造成的困難和由於日益嚴重的海底淤積，特別是氹仔與路環西面之間的淤積造成的船運不暢。

雖然我解釋說海底是流質的爛泥，但教授仍嚴厲地批評靠填海連接離島的做法，指出應建造一座矮橋；不過，當我介紹了在西面海上填海造地的巨大好處和根據著名水文地理學家的研究取得的成果時，他就不再那麼嚴厲了。

他問政府是否有將澳門與氹仔相連的計劃。答覆是現成和肯定的，只是由於沒有資金，還不能列入正在實施的發展計劃中，然而，在氹仔一環環連通之後，這個計劃將立即納入日程。

立刻，他主動請纓，要對澳門一氹仔大橋做初步研究，並且提出只象徵性地收取研究工作實際消耗費用作為報酬。

第二天，一個需三百萬托的研究計劃交到了總督那裡，總督又將計劃轉呈海外部。

就這樣，事關澳門和離島進步與發展的著名工程的第一步終於邁出了。

然而，只有在嘉樂庇總督的偉大獻身精神和不懈努力之下，大橋才有可能建成。在克服了各種各樣的困難和經歷了多種曲折之後，大橋終於在他的任職期間於 1974 年底建成通車了，從而使他的工作達到了頂峰。

15、1974 年底，我們在陸軍參謀部瞭解到把與強大的中國相比微不足道的澳門武裝部隊改為保安部隊，其職責與現在的保安部隊很相近，即是一支在不同領域為大眾服務、保護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部隊。當時這樣做是有道理的。

早在 1963 年，作為總督和武裝部隊司令，在最高軍事委員會考慮裁減士兵數量時，我們就認為，澳門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而不是軍事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的外交部長弗朗科·諾蓋拉博士卻具有奇特的、超越我們的理解。對於他來說——一次，我返回里斯本見到他時，他對我說——葡萄牙在澳門應只限於葡國的管理，總督和旗幟即是其象徵，為此，只需一支小部隊——他認為便是那裡唯一需要的軍事力量——滿足在重要場合下應有的儀仗需要。當然，這支部隊不會影響警察性質的保安部隊維護公共秩序和安定。但是，在一個葡萄牙政府中，在對澳門管理上，中國有生力量佔居主要位置，這個觀點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認為，一個是應始終尊重中國利益，接受他們在地方行政中的參與，另一個也許就是葡萄牙在那裡僅以一個象徵的形象保持其最低的

尊嚴，關於這一點，如果說並非不可，然則亦實難辦到。

IV

距葡萄牙在澳門管理結束、澳門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時間還有八年多，到那時，正在討論中的基本法將指導以後五十多年的公共與民間活動。人們會問：澳門前途如何？毫無疑問，這是一個令人關注的充滿疑問的題目。

現在，經過韋奇立將軍謹慎而明確調整之後的葡國行政管理將與時間展開一場巨大的鬥爭，不斷尋求全面實現過渡期的主要目標。

另一個重要問題涉及由澳門預算支付薪金的公職人員，不論其地位和職務，必須保證他們在 1999 年之後在澳門所獲得的權利。

人們關心的不僅是葡萄牙的聲譽和名望，還關心那些在澳門出生、不想離開那裡的一小部份葡萄牙人的情況，這一部份人希望到那時，除允許他們做好適當準備加入未來公共和民間機構中當地幹部的隊伍外，還享有保證他們的地位的條件。

1999 年之後，哪些是可以保留在中國管理和主權內的、保護希望留下的葡國公民和澳門當地人利益的呢？基本法將規定至 2050 年澳門的生活，但是，只有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批准或修改它。

1999 年以後，哪些葡萄牙政府的法律機構能夠為中國主權接受繼續發揮作用？

在文化和建築遺產方面，澳門政府將會盡全力加以保護。

在語言和文化方面，建立可以留下來傳播葡萄牙語言和文化的有效方式，這件工作永遠也不會為時過晚。

準確地說，誰也不會懷疑葡萄牙過渡時期小組的最高核心利益就是維護 1999 年以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葡萄牙人的前途。在未來幾年內，為在澳門保留葡萄牙形象，並且，保護留在澳門的葡萄牙人生活條件而進行的努力中，韋奇立總督將是最忠誠的捍衛者。

一幅送給雍正皇帝的 里貝拉宮壁畫

若昂·德烏斯·拉莫斯*

里斯本如今商業廣場的位置在 1755 年地震前曾經是里貝拉宮所在地。該所由唐·曼·努埃爾一世命令修建的華麗皇宮在長達兩個世紀的時間裡收藏了數目可觀的名畫、傢俱、壁毯和兵器，並且有一個當時最大的藏書庫。然而所有這一切都被那場地震所摧毀。這對葡萄牙乃至全人類的文化藝術遺產來說都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最近，馬托斯·塞蓋依拉的著作《逝去的時間》^①中有一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它提到里貝拉宮的壁毯，指出其中一幅壁毯作為精美禮品的一部份由唐·若昂五世委託亞歷山德列·梅德路·索薩·梅內塞斯大使贈送給中國皇帝。這樣就出現了這幅壁毯在東方到哪裡去了的問題。

馬托斯·塞蓋依拉在其作品中並未對里貝拉宮的藏品及裝飾物做太多描述，只是說他從舊書商手裡買到一本 1670 年由安東尼奧出版社在里斯本出版的由 D·迪埃格·恩里克·維萊加斯^②著的一本名叫《聖洗及誕辰金字塔》的書。那本書描繪了當時唐·佩德羅二世國王和瑪麗亞·弗郎西

斯卡·薩波拉王后於 1669 年 4 月 9 日為其長女出世而舉行慶典活動，以及在里貝拉王宮皇家教堂舉行洗禮的盛況。D·迪埃格·恩里克·維萊加斯利用時舉行的最後一項活動——由此便產生了書中最有趣的事——描繪了宮殿的大廳、樓梯、走廊和房間以及為慶典活動而準備的各種華貴裝飾品。根據 D·迪埃格的這篇文章，馬托斯·塞蓋依拉用了十二頁的篇幅描寫了洗禮行列經過的所有地方及身居高位的外國嘉賓和王室貴人。

壁毯不計其數，美侖美奐。宮中第九個大廳通向一個走廊，那裡有一幅名叫“弄奧瓦列斯”或者“御前大臣”，用絲、毛和金線並且由“華貴”及“上等”絲綢做為襯裡^③而製作的掛毯尤其醒目。馬托斯·塞蓋依拉寫道：“在王宮牆壁上飾掛的其他壁毯中大多數都不會有和這幅掛毯相同的命運。1725 年，唐·若昂五世任命亞歷山德列·梅德路·索薩·梅內塞斯博士為赴中國使者^④並由他將這幅珍貴掛毯和其他禮品一起送給中國皇帝。

* João de Deus Ramos, 法學碩士(里斯本大學)於 1967 年進入外交界任職東京及日內瓦，並曾於 1979 年擔任駐北京大使館臨時代辦。1982 年任外交部政治事務局非、亞及大洋洲事務主任。1983 年任駐莫桑比克大使；1982 年任葡中關於澳門問題談判葡方代表團成員和澳門國際委員會代表及二等全權公使；1988 年任葡中聯絡小組組長助理，葡中土地小組首席代表。榮獲西班牙天主教伊莎貝爾銀質勳章，阿根廷五月功勳級政府勳章，日本神聖大藏級勳章，南歐國家金橙——拿騷騎士級勳章及巴西里約布朗庫騎士勳章。

正如亞歷山德列、梅德路博士所做的《使團關係錄》^⑤及弗雷·曼努雷·曼努埃爾·多斯安若斯所著《世界通史》封面中所印的一件注釋手稿證實的那樣。

《使團關係錄》由比科爾發表並包括索薩·梅內塞斯帶往北京的禮品清單，但是該清單卻載於若干收藏檔案的原件手稿中：

——里斯本國家圖書館，藏書編號 8025，“關係錄禮品……”無頁碼：“（……）兩隻”相同的木箱裝有一幅壁毯由九塊組成，畫面為土地和房屋，由深紅色絲綢做襯裡”。

——里斯本科學家，“紅色系列”，第 355 號，《禮品記錄》，第 267 頁及其一級……兩隻相同（本箱），有一分爲二之壁毯^⑥，畫面為土地、房屋，深紅色襯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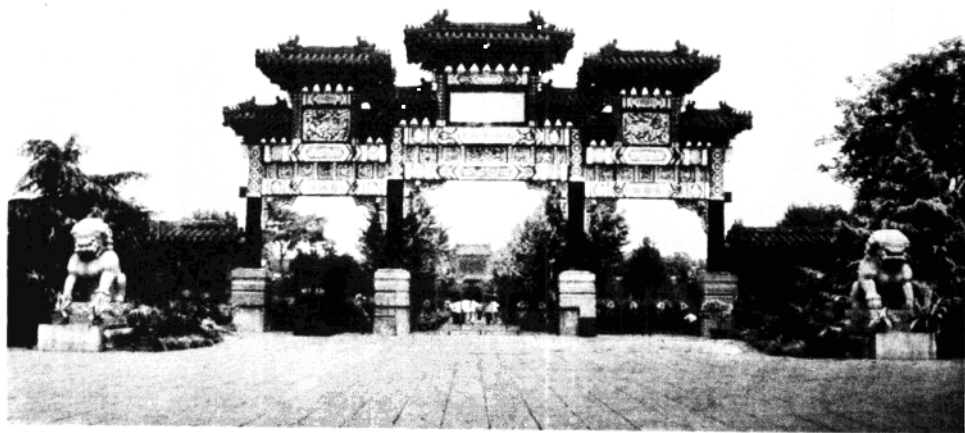
——埃烏拉市檔案館，編號 CXVI 禮品記錄……”（未標出頁碼）：“兩隻相同木箱裝有一幅由九塊拼成之壁毯，分別代表土地及房屋，由深紅色絲綢做襯裡。”

毫無疑問，在由唐·若昂五世送給中國皇帝的禮品中有一幅由九塊布拼成並分兩箱裝運的

壁毯。但是，這裡對馬托斯·塞蓋依拉所說的壁毯名稱是《御前大臣》的結論產生了疑問。第一，似乎不符合“土地與房屋”的描述。第二，如果是“弄奧瓦列斯”，這是我國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若將這樣的說明遺漏是令人奇怪的。不過，這點可留給藝術史的專家們去研究。

索薩·梅內塞斯及其隨從一起於 1725 年 4 月 12 日登上了停泊在里斯本港口的《奧利維拉聖母》號三桅船^⑦。由於等待風向，直到這個月 17 日才啓航。索薩·梅內塞斯作為唐·若昂五世的使者此行去中國是爲了感謝康熙皇帝數年前向葡萄牙王室贈送禮品一事並且祝賀雍正皇帝登基即位，以及希望由於新皇帝在對外關係中推行了強硬政策^⑧而陷於危險之中的澳門利益及中國的傳教士活動提供保護。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度過冬天後，他們於 1716 年 3 月 25 日抵達巴塔利亞並在那裡停留一個月。於 1776 年 6 月 10 日終於在海上望到澳門。13 日，大使及隨員舉行登陸儀式。裝有禮品的木箱由澳門總督^⑨根據索薩·梅內塞斯的命令派人看守。在《使團關係錄》中這樣寫道：“總督迎接我們事畢後，即進入船艙小心檢

北京雍和宮之牌坊 雍正皇帝曾在此居住



查物件。所有東西都完好無損，唯獨兩塊後來送到宮中時已被蠹蟲蛀蝕的拉斯掛毯^③受到損壞。”

上述記錄正好與埃烏拉檔案館保存的一份未公開的手稿所載內容相符合。它應該是路阿神父(Padre Francisco Xavier da Rua)《使團關係錄》的草稿。

和里貝拉宮其他許多藏品一樣，由索薩·梅內塞斯帶往中國的壁毯到1725年時可能已經很陳舊，如果確實是《御前大臣》的話，到當時已差不多有兩個世紀了。馬托斯·塞蓋依拉寫道：“由絲和金線製作的壁毯（我們這樣稱呼它，儘管這一定義並不確切）如果是（D·迪埃格·維萊加斯）描述中所說的《御前大臣》，那末就一定是亞歷山德里諾大主教所說的教皇於1521年在維索查鎮杜卡宮留下的那幅壁毯。

從1725年4月至1726年6月的海上航行毫無疑問有助於加速一件相當陳舊且糟爛物品的損壞。從閱讀資料況看，大致可以肯定只有布製品在航行中遭受影響……“所有東西都完無損，唯獨兩塊拉斯掛毯……”。儘管如此，“掛毯還是送到了北京，然而卻已被蠹蟲蛀蝕”了。

毫無疑問，從歷史浪漫主義的觀點出發，可以想象一幅描繪摩爾人英雄的壁毯在北京城保護天子的皇宮。但是人類及蠹蟲極平常的現實卻不允許這樣做。

【註】

①古斯塔夫·馬托斯·塞蓋依拉(Gustavo de Matos Sequeira)《逝去的時間》(葡京散文)，里斯本Portualia出版社1923年出版，從43頁起。

②即巴波沙·馬沙杜(Barbosa Machado)盧濟亞圖書館，I. 659，按葡語方式取名為D·迪埃格·恩里克·維萊加斯。《藏金金字塔》一書由西班牙文寫成。

③“華貴”是修飾一種絲織物。“上等”亦指一種裝飾各色花卉的絲織物（見安東尼·莫拉依斯·席爾瓦著《葡萄牙語精編新詞典》）。

④馬托斯·塞蓋依拉的原文中這樣寫道：“……作為使者，亞歷山德里·梅德路·索薩·梅內塞斯和耶穌會修士約瑟·馬加良斯(José de Magalhães)神父……”本人在轉摘中沒有引用是

由於有兩處不明確：第一，上述耶穌會士不應是約瑟·馬加良斯(José de Magalhães)而應當是安東尼·馬加良斯(António de Magalhães)；第二，馬加良斯神父是把康熙皇帝的禮物轉給D·若昂五世的使者，他只是陪同索薩·梅內塞斯博士出使中國。

⑤索薩·梅內塞斯曾為他的外交使命寫了一份報告，但一般認為有關文件是《使團關係錄》。作者是弗郎西斯科·沙維爾·路阿神父，當時其身份是使團秘書。這部《使團關係錄》由比科爾(Júlio Firmão Júdice Biker)在其《條約集》第6卷公佈。1885由里斯本國家印製所印刷。無論是使館的報告還是秘書寫的《使團關係錄》都未包括上文有關手稿中所載的禮品清單。一份表格式禮品清單於上個世紀中葉公佈於《Arquivo Pittorsco》(卷IV第254頁)。文德泉神父從中引用了該清單並刊載在他的著作《十八世紀的澳門》中，該書1984年由澳門官印局印製。

⑥本人猜測布塊數目和木箱數目之間出現了混亂。裝箱的物品是兩件。科學院的文件是最新引用的文件，上面有“第三級聖公會執事維森特·紹加(Vicente Sakgado)”的文件說明。

⑦在十八世紀確有數艘用此名稱命名的三桅船，但沒有任何一艘存在於索薩·梅內塞斯出使期間。因此應該是一艘兵船而不是三桅船。裝備有五十門砲的“奧利拉聖母”號兵船於1721年在里斯本下水。據《Gazeta da Lisboa》報介紹：“國王陛下和親王殿們在他們夫人和皇家官員的陪同下出席了下水儀式。在裝飾著鑲金花紋和絲絨掛毯戰船如林的河邊專門建起一座氣勢雄偉的木製臺。國王陛下及皇族殿下們登上皇家雙桅船來到該建築物，然後再通過搭船的棧橋返回。在木制建築物中擺滿了類似場合食用的豐盛甜食和飲料。”該船曾數次遠航巴西和東方，從1737年起則不再有該船資料。（見安東尼·馬貴斯·埃斯巴特羅編撰的《海上三世紀(1644—1910)》一書，該書藏於海軍中心圖書館，1972年版，第五卷第99頁及其後）。

⑧D·若昂五世曾通過馬加良斯(António de Magalhães)神父於1722年12月接受康熙皇帝的一部份厚禮（除一個“珍珠盒”外，其餘全部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船上被焚毀。雍正康熙第四子，於1722年12月27日登基統治國家直至1735年10月8日駕崩）。

⑨當時的總督是阿爾卡索瓦(António Carneiro de Alcaçova)。於1724年4月6日上任。但於次年索薩·梅內塞斯完成其在北京的使命返回澳門時，總督已是巴雷托(António Moniz Barreto)（見文德泉神父著作《十八世紀的澳門》）。

⑩法國北部城市阿拉斯(Arras)風格的壁毯。十當時歐洲頗具盛名，同時也傳入葡萄牙。後來法國、意大利或法蘭德斯的壁毯全都被統一稱做阿拉斯(Arras)掛毯或拉斯(Ras)掛毯。

李長森譯

【附錄】

雍正皇帝

由唐·若昂五世國王給送去那幅命運坎坷綉有“御前大臣”畫面壁毯的雍正皇帝統治國家並非一帆風順並且一直未擺脫政局混亂的局面。但事實上他是一個鐵腕改革人物。他渴望權力同時又對國家的發展與穩定憂心忡忡。

雍正真正名字叫胤禛，同時也被稱做“清世宗”，是康熙皇帝第四個兒子。他登上皇位並非順利。其合法地位由於其父親在世時宣佈廢黜長子胤禔而雍正長兄的當然即位資格而實現。康熙於1722年駕崩後兩兄弟為爭奪皇位而展開了一場激烈爭鬥。

還在老皇帝去世以前，兩人便實施影響以取得朝中強勢者的支持。在政治舞台的鬥爭藝術方面，雍正比他哥哥要計高一籌。他想方設法將大清帝國強人陸六良和川陝總督及全國裝備最為精良軍隊的指揮官年羹堯培植為自己的親信。但是，剛剛接過康熙帝的龍椅，他便立即以殘忍的“文字獄”手段羅罪狀陰謀設置狡詐機關除掉那兩個曾保證他登上皇位的人。他先是對年羹堯宣佈了七十二條罪狀逼其自殺，然後指控其叔父陸六良犯有四十二條罪狀，將其打入大牢永不得自由。這或許是由於這兩個人後來逐漸變得自傲不羈的緣故，使得雍正皇帝毫不遲疑地將其除掉。其他幾位同樣是皇位繼承人的太子或者被秘密處決或者被關進了與世隔絕的牢獄之中。

雍正即位後所採取的第一批措施即是為了一味地擴大及鞏固皇權。他開始大力限制各旗軍隊將領的權勢，同時組織秘密御林軍以監視諸臣並禁止其組織派別。這支類似警察的軍事部隊有權在任何時間進入官員住宅以檢查其財產和搜查串聯文件。因此，雍正還被贈以古怪的綽號：“篋子搜查皇帝”。



作為一個出身滿族的皇帝，雍正念念不忘結束宣揚漢人至上的傳統。在這方面採取行動的例子之一是他發動了一場累及陸六良（音譯）的迫害運動。1727年一位名叫曾京（音譯）的文人企圖說服川陝總督岳忠奇（音譯，據說是宋朝名將岳飛的後代）認同漢人對中國其他民族的優越。為此他引用了曾書寫宣傳反對滿人的已故思想家陸六良的理論。曾京的目的是煽動總督造反，但該總督並未使其計劃得逞並立即將其關入監牢。

當時雍正非常關注此事並以鐵腕手段進行處理。他甚至親自提審曾京以便能供出有關政敵的全部情況。接著，他命令掘開陸六良的墳墓當眾碎屍。然後命令將兩人直至下一代的全部家屬和親戚處死。這種斬草除根的殘酷迫害極大地震動了當時整個中華帝國。最後，雍正還親自選寫了一本名叫《真理反對謬誤》（意譯）的書並在全國刊行，批判了陸六良的理論，宣佈全中國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該書在發行問世後要求所有人都必須仔細閱讀認真學習。

1726年雍正命令他的軍隊佔領了貴州、雲南兩省，終於以武力廢除了當時在

地方部落中實行的酋長頭人制度，代之以皇帝直接挑選和任命的官員這一行動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這些部落存在的奴隸制並且加強了不同民族人民之間的聯繫。這被認為是一種對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完整做出的積極貢獻。

無論如何，雍正將清王朝的權力推向頂峰是一個事實，尤其是親自率領軍隊在中國西部遠征以後。他藉口有利於發揮軍隊最高統帥部的機能和運作以及更好地保守軍事機密而設立了“軍機處”。這個機構在戰爭以後變成了常設最高軍事指揮機關，直接置於皇帝領導之下而凌駕於貴族和政府官員各種機構之上。

在其統治期間，農業和其他經濟領域顯示出明顯的全面發展，這種情況部份應歸功於他大膽的稅收改革。在他剛剛即位以後，接受了河北巡撫李衛君（音譯）“攤丁入畝”，廢除人頭稅的建議，這就減輕了農民的賦稅負擔並且在調查家庭人口數字時消除了虛報人口的現象。雍正皇帝在經歷了十三年的動盪統治後於1735年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

李長森譯

土生群體

人類生物學的若干資料

安娜·瑪麗亞·阿馬羅*

自稱“大地的子孫”的土生是一個具有多種遺傳淵源的歐-亞群體，其人類生物學的研究正有待進行。安東尼奧·德·阿爾梅達 (António de Almeida) 博士 (與他的女兒瑪麗亞·埃米莉亞·德·卡斯特羅·埃·阿爾梅達博士合作)、阿爾梅林多·萊薩 (Almerindo Lessa) 博士和雅克·呂菲 (Jacques Ruffié) 博士在這個方面已做過一些嘗試。但是，由於標本的成份混雜，使他們未能如預想的那樣為土生定性。這個在19世紀並可能自18世紀起就出現於社會的群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於孤立狀態。對有關世系圖的研究可以證明，由於偏重與歐洲人和本社會群體成員之間的婚姻，某些家庭存在明顯的同配生殖現象。我們舉出所遇到的最有興趣的兩例。自上世紀末葉起，“大地之子”群體向中國社會開放。另一方面，由於自那時起的澳門政治經濟形勢動蕩，主要家庭的許多人都移居海外。所以，我們認為，對於一個選擇標本做一番認真研究，以便從人類生物學的角度給土生群體定性，如果說這在今天並不是不可能的事，但也將因上述原因而變得非常困難。

在有限的生態環境中可以更清晰地觀察該環境地域和居住在該地域的生態群落之間的聯繫環境因素越狹小，選擇就越緊迫，生物地理群落在種類上就越單一、越獨特、越貧乏。澳門正是如此，其非常有限的環境因素，諸如缺水、孤立的地理位置——幾乎是一個島——、夏季高溫 and 寒冷季節的低溫，不但使這裡即沒有豐富的動物群落，也沒有豐富的當地植物群落，而且，還使得

許多西方物種適應環境的多次嘗試不果，及令第一次駐足於此的歐洲人被迫利用相鄰地區和其生存方式得以維生。

與現實世界包括人口平衡的建立，在澳門經歷了幾百年。初始，歐洲人的死亡率很高；然而不久，他們的歐-亞混血後代經過童年期的自然選擇，從生理形態學的觀點上看，有了更好的可以適應的條件。另一方面，在幾百年間，建立起了生存的文化形態，其中不少的為原始形態。生物形態和文化形態在經過生存環境的選擇後土生出現了，其原始文化在今天的澳門還留有遺跡。

土生群體將自己封閉起來。這種現象完全沒有生物學的基礎，但卻可以引出新基因組、新表型混血、新的心理學標準和新價值觀的產生。東方世界特有的敏銳、穩重、喜歡炫耀，以及在選擇女性配偶時所持的、長期以來作為當地形態生理學選擇標準的對女性的新的審美觀都是例子。

關於這一點，在上世紀的葡萄牙，福態、細腰、皮膚光潔蒼白、踝骨纖細、薄唇的女性是美的典範，而在澳門，這樣的女性會貽笑大方。“肥婆”（肥胖或有發胖趨勢的女性）在今天仍然是當地老年女性對葡萄牙的“牛婆”或女性的稱呼。大鼻子、肥胖身軀和大腳是遭到拒絕和恥笑的主要原因。

對於土生群體在部份意義上的孤立，特別是在18和19世紀，當土生已經形成社會階層、王國的女性來到澳門、群體意識有所加強的時候，其解釋應到當時社會的同配生殖現象、至少在最古老和最主要的家庭中的同配生殖現象上去尋找

* Ana Maria Amaro, 新里斯本大學社會及人文科學學院博士；社會及政治學學院人類學系教授，若干國際組織（如國際人類學學會）的成員。



兩位土生。阿爾貝托·帕切科·若熱（Alberto Pacheco Jorge）先生，D·瑪迪德·奧古斯塔（D. Matilde Augusta）和土生若瑟·維森特·若熱（Jose Vicente Jorge）之子。D·瑪迪德·奧古斯塔·帕切科·若熱，葡一印後代的土生，著名收藏家若瑟·維森特·若熱（綽號“黑種男爵”）之妻。（照片係作者發表於《加西亞·德·奧爾塔》內，5，1/2，1987/88）。

（安德拉德（Andrade），1847）。

從前面對家系所做的分析中，可以對這種現象做出最顯而易見的結論。

一方面，中國人關閉自己的群體；另一方面土生開放群體只為與歐洲人，特別是與軍官或高級官員聯姻。^①

關於同配生殖應考慮兩種基本形式：對後代造成表型相近的主動同配生殖和被動同配生殖，即非相近配偶雙方的逐漸混血。

第一種情況即土生之間的婚姻，正因為如此，幾乎所有土生看上去長相相似；第二種情況即土生偏重金髮明眸的女性而與群體之外的歐洲女性或歐一亞混血女性結婚。

不過，任何人類居民都略帶同配生殖傾向，尤其在數量特性方面，土生也毫不例外地具此傾向。以身高的情況舉例，很少見到一個身材矮小的男性娶比自己身量高大的女性為妻。另一個因素是心理與社會特性方面的，混血人對這個因素

特別地敏感。從性質上看，偏重內部通婚造成的遺傳學後果與血緣關係混雜的後果一樣。澳門地域狹小，社會高階層家庭的數目有限這兩個特別有利於這種血緣關係，這是在澳門生長起來的（無地理屏障，僅以社會因素為屏障的）部份意義上孤立者偏重式婚姻的結果。

如人們看到的那樣，不論是同配生殖還是內部通婚，它們都有減少雜合遺傳型出現的傾向，除非能導致某些特徵的穩定，在多重混血的人口，這種傾向較少呈現。在一個封閉的群體中，這種現象或許需要接連不斷的許多代才會出現。

相似的人們採取偏重式婚姻關係的孟德爾式人口（População mendeliana），不論其特徵，都伴隨著隨機交配意義上不同基因型的出現而趨向停滯狀態。根據我們所知，就土生群體來說，從未對出現情況做估算。對土生的人類學、血清人類學、人體測量學，甚至骨測量學的研究有待進行。一些旅行家曾以簡短的敘述描繪澳門人的人類學

特徵。請看下面的例子：

“除一些家庭的盧濟塔尼亞血統未混血外，居民都是混血人、有色的印度人和黑人。”（拉普拉斯：《環遊世界》，234頁。）

當代一些作者（A. 阿爾梅達，1961/62/69 [A. Almeida]），（萊薩 [Lessa] 和呂菲 [Ruffié]，1966），對澳門居民血清學曾進行過研究，但是，實際上，直至今日，任何人也未在其研究中採用選擇性的或具有顯著意義的抽樣調查，而另一些則把土生和使用葡文姓名的中國人包括在同一個標本中。不過，我們認為，由於（可能自定居家庭的名字開始經常出現的18世紀起就局限於同配生殖的）典型的土生在澳門已經相當少見，進行這種抽樣調查以便獲得某些有效數字的工作已十分不易。

事實上，自19世紀中葉起，一代接一代的“大地之子”就與歐洲人和中國人通婚。另一方面，19世紀中葉的移民浪潮和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前不久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加劇了混血優勢。

儘管像已經談過的那樣，男性少於女性而在數字上不成比例，婚姻（可做為擇偶對象的平均人數）的範圍在澳門的葡萄牙居民中相當有限。

混血是一個歷史現象，然而返回父母的形態卻總是一種特殊情況。如“染色體交換”（Crossing Over）的比例是百份之一的話，遺傳學的完全融合則需一百代人，但是，根據貝諾伊斯特（Benoist），在同遺傳源的融合中，完全融合只需六代人。我們可以從圖I和圖II的世系圖中找到這六代人。

表型同配生殖，即偏重式擇偶，在土生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幾個世紀前，當依靠表型相似而選擇歐洲的或群體內婚姻的話，應當承認，從歐洲居民一方來說，許多情況下，這種選擇不是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的。

古老家庭帶有同配生殖特徵^②的後代土生呈現出與赫爾塞（Hulse, 1968）為內部通婚和向血緣婚姻的後代建立的相互關係一致的人類人體學和血清學特徵。

在一次儘管為小規模的抽樣調查中除短頭傾

向外，在“大地之子”身上，我們找到了如下聯繫：

		根據赫爾塞	土生 (選擇標本) 25人
血緣關係的自身互相作用	身高	負	負
	頭長	略呈負	略呈負
	頭寬	負	負
	血壓	收縮壓弱，舒張壓強	多種
	血槽	負	負
	膽固醇指標	負	負
雙胞胎出生		正	在澳門，雙胞胎罕見

根據我們以後確定家系所使用的抽樣調查，不但現在，而且在18和19世紀，土生家庭中就很少出現雙胞胎；因此，難以確認或否認赫爾塞所建立的相關作用中最後一項結論。

關於土生的血清學，由於隱性性狀的表型的出現是基本特點，在血緣關係的情況下，也許會看到大量O型的出現。

根據施奈德（Scheider，1976），在內部通婚的居民中，血型大部份為A和O型，如果說這一點並不重要的話，它卻是遺傳學上的特徵。

BN和ON型在中國人中居多，這些血型和ABN型有可能像一些作者希望證明的那樣，在葡萄牙人和天國的子孫之間由來以久的廣泛混血的情況下，大量出現在土生中間。

由於前面所說的沒有抽樣調查的選擇，我們無法從安東尼奧·德·阿爾梅達博士的研究中得出最後結論來佐證我們的設想；但是，我們不妨對這些僅有的研究做一些分析。

1. 安東尼奧·德·阿爾梅達博士收集的資料（1959）

土生被看做中國南方人，因此，具有如下特點：身高在平均高度以下，身材瘦弱，直髮，中等頭形，中型鼻子，嘴唇厚度適中，吊眼，眼睛帶有典型的蒙古人種的皺紋，另一些則此特點不明顯。

關於Rh因素，我們在這個群體得到的數值很小：

Rh+99,00%+1,07%

Rh-1,0%+1,07%